

On the “Follow-The-Majority” Phenomenon in China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Jianwei Zhong¹, Yuhua Liu²

¹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²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Email: zhongjw04@126.com, liuyuhua1021@126.com

Received: Jul. 19th, 2012; revised: Aug. 10th, 2012; accepted: Aug. 17th, 2012

Abstract: The so-called “follow-the-majority” phenomen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obstacle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China’s universitie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at the research of the phenomenon and its hidden work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features of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universities; various universities gain their social legitimacy through “follow-the-majority” under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therefore maintain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t is found that changes need be started from the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al features and environment, along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management in order to eradicate the “follow-the-majority” trend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in universities.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llow-The-Majority”

组织社会学视角下我国大学的“跟风”现象研究

钟建伟¹, 刘玉华²

¹江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南昌

²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昌

Email: zhongjw04@126.com, liuyuhua1021@126.com

收稿日期: 2012年7月19日; 修回日期: 2012年8月10日; 录用日期: 2012年8月17日

摘要: 我国大学的“跟风”现象已成为制约我国大学创新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本文欲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 对我国大学出现的“跟风”的现象及其背后机制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认为我国大学具有制度化组织的特征, 大学通过“跟风”行为在我国教育制度环境下获得“社会合法性”, 从而维持其生存与发展。而要从根本上根除这种跟风行为必须从改变我国大学的制度化组织特征和优化大学所处制度环境入手, 通过引入市场治理等手段提高我国大学的管理绩效。

关键词: 组织行为; 大学; 制度环境; “跟风”

1. 引言

我国近代以来的教育体系是一个“舶来”之物。伴随着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和“虔诚”的传教士们, 西方的教育形式开始在中国扎根、发展。到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设立, “意味着中

国近代意义上最早的国立大学的诞生”。而在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是“中国近代首次建立的学校教育系统”。到了1904年清政府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 “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较完真并贯彻实施的学制”^[1]。1906年开始停止科举考试代表了中国传统文

化教育体系在政府中被废弃了，西方的教育体系在中国获得了官方的认可。而作为西方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的一环——高等教育也在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历程。作为一个西方传到中国的事物，大学的组织形式是比较容易模仿的，但大学的精神则是无法复制的。中国人对它的发展规律经过漫长的探索，直至今日仍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讨论问题。

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我国大学呈现出诸多与欧美国家大学不同的特殊景象。其中大学之间的“跟风”现象无疑是重要表现之一。我国的大学中存在的“跟风”现象主要是指各重点大学和地方大学跟着清华、北大等一流大学的改革步伐去改变自己的组织管理制度和行为，从而造成我国各种类型、不同传统和定位的大学在组织结构、目标和行为上逐渐趋同。这与欧美国家大学所呈现出的多样化的特色具有天壤之别。

不管是研究生要超过本科生的“研究型大学”的“大跃进”行为，还是将学校建成五脏俱全的“综合性大学”的“大建设”运动，亦或是以SCI为指标的科研定量考核方法，这些由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等一流大学率先提出，并在短时间内被各所大学所模仿和运用。然而这种“跟风”性的行为往往都不能取得预计的结果。这是因为各所大学的传统、财力、人力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盲目的跟风行为并不符合这些大学的实际，其管理绩效必然低下，严重影响了我国大学的发展。

对于这一现象不同学科的学者也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这一行为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教育管理学的视角将其视为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行为，认为其不符合管理学的原理，是一种非理性行为；高等教育学的视角将其视为违反高等教育规律，是我国高等教育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深入探讨这一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如何出现在“研究高深理论”的大学之中，产生这一现象的背后逻辑机制是什么。本文力图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把各个大学作为独立的组织对它们的“跟风”行为进行一番考察，力图揭示各个大学在“跟风”行为背后的机制，从而为解决我国大学“跟风”行为提出具有操作性的针对性解决方案。

2. 作为制度化组织的中国大学

从组织社会学视角来看待我国大学“跟风”行为，

首先要弄清楚我国的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与其它的机构比如行政机构、商业机构等组织的不同点在哪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回顾一下组织社会学对组织与制度的关系的研究。对组织与制度关系研究的有一个制度学派，这一学派在分析组织现象时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各个组织的内部结构是如此的相似。这是与传统的经济学解释相违背的。经济学解释的原始出发点就是认为一个组织的行为包括怎样建构自己内部的组织结构所取向的目的都是效率。效率是决定一个组织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的唯一标准。而效率是随着技术条件、环境条件等不同而不同的。那么处在不同的技术条件和环境等条件的组织的内部结构就应该是不同。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促使研究者从新的角度去分析各个组织结构趋同的问题。

John Meyer 和 Brian Rowen 指出组织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2]。技术环境就是指这一组织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和与市场的关系，这就要求组织提高效率，这样才能使组织获得生存的机会。制度环境则是指“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等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3]。这就要求组织能满足各种制度的要求，组织生存的理由在这些制度中得到体现，就是在满足组织所面对的各种制度的过程中，组织制度化了。组织的制度化过程即组织或个人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做法或“社会事实”的过程。任何组织都必须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双重要求。我们可以把所有组织依据其对技术和制度的依赖的程度排列在一个连续变化的轴。在轴的一端是技术组织，这种组织的生存完全依赖技术环境，它的行为完全以效率为标准，这是以前经济学研究的理想组织。在轴的另一端是制度化组织，这种组织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制度环境，所以它的行为也是以满足制度要求为标准。现实的组织是即具有技术组织的特征，也具有制度化组织的特征，都处于这条轴两个端点的中间，我们把对技术环境依赖程度高的组织称为技术组织，把对制度环境依赖程度高的组织称为制度组织。

制度环境又是通过什么机制诱使或者威逼组织去满足制度的要求呢？制度学派提出了一个合法性机制的问题。正是通过合法性的压力和激励促成组织

去改变以适应制度的要求和变化。合法性机制的基本思想是：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较强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一旦组织的行为违背了认为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的要求，就会得到人们的反对。而组织在这中间所受到的损失就取决于这一组织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制度化程度越高的组织受到的损失也就越大。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体系下，我国的大学属于国家的事业单位，居于国家再分配体制之内，是属于典型的“再分配体制下的制度化组织”^[4]。这是因为政府是大学的举办者、行政管理者和事实上的办学者^[5]。在高等教育部门，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部门)仍在相当程度上按照集权模式进行管理^[6]。在这种体制下各个大学的资源大都握在政府之中，在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政府对这些大学的资源输入是组织生存的关键。同时，各个大学校长、副校长的任命权集中于中央各部门(包括教育部)，校长主要对上负责。我国大学组织的生成和发展几乎不依赖于对技术环境的适应，而主要依赖于所处的教育制度环境，所以应该将我国大学组织视为制度化组织。

3. 我国大学“跟风”现象的逻辑

作为“再分配体制下的制度化组织”，大学就得适应我国教育制度环境。大学的“跟风”现象就可以看作是我国大学在中国社会制度环境下寻求合法性的一种表现表现形式。

3.1. 为什么“跟风”的对象是清华、北大等一流高校？

在目前我国大学体系中存在着显著的金字塔结构，教育部通过“985工程”、“211工程”等项目将我国大学分为不同档次的学校。同时国家通过对不同大学给予不同强度的财政支持政策以及行政级别更加固化这一金字塔结构。在大学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清华、北大等一流高校就成为各级领导和社会舆论衡量大学发展水平的标尺。在此制度环境下，清华、北大等一流大学的组织结构、管理制度等行为就成为处于金字塔中下端的大学的模仿跟风对象，以他们的行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正

是他们在目前我国这种制度环境下的理性的行为，也为他们的生存带来了最大的“合法性”。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反而会被制度环境所反对，使自己的“合法性”出现危机。

3.2. 地方大学为什么“跟风”而不是自主改革

在目前我国高校所处的制度环境来看，地方大学如果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自主改革，这样的改革往往风险极大，效率不高，反而是非理性的行为。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大学的生存源泉是领导的满意度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度。当领导的满意度和社会的支持度以清华、北大等一流高校作为标准时，这种改革往往是很难被认可的。

还有一个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问题。在什么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还没有确定之前，要衡量一项改革成败就没有基准。在大学教育系统中进行改革实验，它的效果往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显现，但是我国目前的考评制度一般是一年一评，改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能产生可以看得见，可以评定的成绩的话，是不会被认可的。而且目前的大学领导的调动频繁，一个领导的改革很难得到长久的贯彻，就是改革获得成功也很难归到这个领导人身上。一项改革的成功概率本来就不是很高，即使成功了也很难被评定，即使有一天被认定了，现在的推行者也许早就调到别的地方了。这样的改革激励对一般的大学的吸引力就显得太小了。如果理性上来看，改革的风险太大，一般大学也就不会去自己主动谋求改革。在这样的条件下，跟随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改革步伐，做一个“跟风”者，无疑是合理性的。对上可以获得领导的赞同，获得学校生存的资源，对外可以满足社会舆论和大众的期望，维持自己的“合法性”。所以结论就是随着大学所处的地位的降低，各个大学自己进行创新改革的动力越小，其“跟风”行为的激励就越大，就越可能不是自己主动去创新改革，“跟风”行为的发生就越频繁。

3.3. 为什么“跟风”的速度会由慢到快

我们发现在这些“跟风”现象过程中，一般都存在一个由慢到快的过程。也就是当清华、北大等一流高校出现新的改革措施，地方高校并不是立马就一窝

蜂式的“跟风”，而是首先有一些大学跟着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的改革走，慢慢的跟着的学校越来越多，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就是制度环境是一个动态变化和形成的过程^[7]。一项改革政策要成为具有“合法性”的制度，需要经历一个“广为接受”的过程。随着接受者的增多，这一行为的制度化程度也就越高。

4. 改变大学“跟风”行为的对策

目前我国各大学出现的“跟风”现象，对于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幅面影响也显而易见的，如果任由这种现象的蔓延，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被其拖累。

而要改变目前各大学的“跟风”现象，关键是要切断大学“跟风”行为背后的动力机制，也就是使得在目前制度环境下理性行为的“跟风”转变成为非理性的行为，造成高校不愿意去“跟风”。而要实现这一方面的转变，可以从降低大学组织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和优化大学组织制度环境两个方面来实现。

4.1. 引入市场治理机制，降低大学组织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组织之所以要顺应制度环境而采取“跟风”行为是因为大学是制度化组织，其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过高。在此情况下，如果不采取“跟风”行为反而是一种对自身组织发展十分不利的非理性行为。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跟风”行为，就需要改变大学的制度化组织特征，降低其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

大学之所以高度依赖制度环境，是因为目前我国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只需满足社会合法性，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则是大学组织管理目标的不明确，真是因为大学组织目标的模糊性使得大学的管理绩效无法通过技术指标来体现。想要提高大学组织对技术环境的依赖程度，就需要增加大学组织的技术指标考核。要实现这一目标，这就需要改变目前大学组织的治理机制，引入市场治理机制，将大学放入市场竞争之中。在市场竞争压力之下，大学组织就必须根据自身的资源配置和市场地位来决定自身的组织架构、制度政策

和管理方法。只有使得大学的行为完全基于自身条件，才能大大降低大学组织的跟风行为，使得大学组织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4.2. 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优化我国大学组织的制度环境

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我们只有遵循其规律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就是不同类型的大学由于其人才培养目标不同而应当构建不同的治理结构和评价方式。而目前我国大学组织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就是太多的行政管制，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大学往往采用一刀切的做法，造成不同高校在治理结构上基本上趋同。同时我国行政部门和社会舆论对大学的评价几乎都是研究型大学的标准，这对于教学型大学和教学科研型大学来说造成巨大的制度性误导。这些类型的大学为满足制度环境的要求，只能跟随研究型大学的脚步，随波逐流、随风而逝，其结果只能是违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产生较低的绩效。

所以要优化我国大学组织的制度环境，就需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较少行政力量对大学的管制和干涉，给大学充分的自主管理权，激励大学根据自身条件进行自主创新。同时应该引导社会舆论，客观评价不同类型和层次大学的绩效，使得社会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大学具有多样化的评价体系，给予大学宽松的社会环境，让其有空间和时间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张惠芬, 金忠明, 编著. 中国教育简史(修订版)[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33-437.
- [2] J. Meyer and B. Rowen.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3(2): 340-363.
- [3]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87.
- [4] 李猛, 周飞舟, 李康. 单位: 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Z]. In: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编, 中国社会学(第二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35-167.
- [5] 申素平. 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角色的转变[J]. 高教探索, 2000, 4: 50-53.
- [6] 试论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URL], 2004. <http://www.edu.cn/20011224/3015093.shtml>
- [7] Tolbert, Zucker.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change in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s: The diffusion of civil service refor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3, 28(1): 22-39.